

中国辞书论集

1997

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编

商务印书馆

中国辞书论集

1997

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

商务印书馆

199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辞书论集 1997/中国辞书学会编.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ISBN 7-100-02948-1

I. 中… II. 中… III. 辞书学-文集
IV. H0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48966 号

ZHONGGUO CISHU LUNJI

中国辞书论集

1997

中国辞书学会学术委员会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948-1/H·754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7

印数 2 000 册

定价: 12.00 元

前 言

中国辞书学会在 1992 年 11 月成立后,把组织和推动学术研究作为自己主要的工作。从 1993 年到 1998 年的 6 年间,共开展各种学术活动 21 次:

1993 年

- ①4 月 浙江宁波 《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
- ②5 月 广州 词汇学和语料库国际讨论会
- ③9 月 北京 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和辞书编辑出版专业委员会成立,并举行学术讨论
- ④11 月 广州 中国辞书学会首届年会暨第四届全国辞书研讨会
- ⑤11 月 广州 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成立

1994 年

- ⑥5 月 上海 举办专科词典编辑学习班
- ⑦7 月 大连 首届双语词典学术研讨会
- ⑧9 月 上海 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成立,并召开首届年会
- ⑨11 月 上海 辞书理论和辞书史专业委员会成立,并召开首届年会

1995 年

- ⑩7 月 哈尔滨 首届国家辞书奖颁奖大会暨中国辞书学会第二届年会

2 中国辞书论集 1997

- ⑪11月 福建福清 辞书理论和辞书史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年会

1996年

- ⑫5月 成都 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年会
⑬6月 江西庐山 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年会
⑭7月 厦门 第二届双语词典研讨会。会议决定在大连、广州、厦门成立双语词典研究中心
⑮10月 北京怀柔 辞书编辑与出版座谈会

1997年

- ⑯10月 杭州 辞书编辑出版学术研讨会
⑰11月 无锡 中国辞书学会第三届年会。第二届国家辞书奖颁奖大会。换届

1998年

- ⑱7月 重庆 双语词典学术讨论会
⑲9月 大连 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换届;学术讨论会
⑳9月 石家庄 首届中青年辞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
㉑11月 西安 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换届;学术讨论会

收在这本文集中的文章是从1997年中国辞书学会两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中选出的。

辞书编辑出版问题至为重要。没有高质量的编辑出版,便不可能有高质量的辞书。辞书完备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的结合,靠编辑出版来实现。然而,这个问题有时又容易被忽视,觉得是技术

问题。其实不然,这里有技术问题,又有学术问题。在今日,更有高科技问题。1997年我们在杭州举办了第一届辞书编辑出版学术研讨会。这是一次有重要意义的学术讨论会。空谷足音,会议讨论的问题极富启示性和历史的预见性。未来的21世纪,我国辞书编辑出版将走向现代化、高科技化的道路。我们需要把握世界辞书编辑出版的新走向,努力探索,大步向前。

第三届学术年会的论文内容十分广泛,包括语文的、百科的、双语的、辞书学理论等诸多方面,但这一届年会论文中有一个显著的方面,就是对王同亿现象的学术剖析和学术批判。王同亿长期以来,以辞书编纂家自居,但在辞书编纂中大量抄袭《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等。1997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王同亿败诉。因此,年会上,批判王同亿现象自然成了热门话题。本论文集集中,有一些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王同亿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不可或缺的。

曹 先 擢

1999.8.2

目 录

前言	曹先擢 (1)
辞典学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	李尔钢 (1)
试谈辞书出版工作的特殊环节	程 荣 (8)
如何认定辞书的借鉴和抄袭	徐祖友 (17)
词典条目释义、出处索源和例句引用中借鉴与抄袭的 分野问题刍议	周 荐 (24)
计算机在大型工具书编辑出版中的开发应用	陆福庆 (33)
有关词典质量的几个问题	陆尊梧 (40)
谈词书的修订问题	张万起 (46)
把词典编纂与词汇研究结合起来	晁继周 (54)
辞书释义与词义研究	苏宝荣 (62)
语文性辞书的语义学原则	长召其 张志毅 (71)
词典标注词性的两项基本原则	黄 华 (80)
试论语文辞书义项内部的一致性	李志江 (88)
辞书中成语注音的分词连写问题	毛永波 (97)
《汉语大字典》的通假字体例	汪耀楠 (106)
语源义研究与词典释义溯源	徐时仪 (117)
对外汉语学习词典对语素、词的结合能力的说明…	李红印 (136)
对中学用英汉词典编纂的思考	金 欣 (147)
语文词典释义中的“等”字用法	李建国 (152)
我国第一部规范性语文词典《现代汉语词典》	晁继周 (160)
《俄汉词典》汉译辨正	冯华英 (165)

2 目 录

《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经过	李世愉 (170)
《中国战典》的编纂实践与理论探索	王天晞 (176)
评《词和词典》一书的词典学部分	卢润祥 (183)
浅议汉语辞书排检法的标准化	陆嘉琦 (188)
中国辞书排检史探	林玉山 (194)
说“六”	胡双宝 (210)

辞典学是语言学的分支学科

李 尔 钢

—

长期以来,辞书学界存在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辞典学已脱离语言学而独立。其最显著的证据,就是专科辞典的出现。因为专科辞典可以“不受语言学的制约,也不需要语言学的指导”^①。专科辞典“对条目的注释不是释词,而是释事物、释概念、下科学定义,介绍有关知识,显然也与语言学没有什么关系”^②。“编纂这些专科辞典需要运用各门学科的知识,却与语言学很少发生关系”^③。因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研究语文工具书的学科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这是合乎事实,合乎逻辑的。肯定研究百科工具书的学科也应归属于语言学,则与事实相背,有悖情理”^④。于是,辞典学可以脱离语言学而独立,便成为其自然推论。但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

从著作性质来说,辞典是研究语言的著作。它属于微观研究领域。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词语。它的任务,就是要用语言将某些词语解释得准确、清楚。在这里,黄季刚先生为训诂学下的“用语言解释语言”的定义是相当适用的。应该说,这是辞典的终极目

的。由于辞典的研究对象是绝对属于语言的词语,所以我们视它为研究语言的著作。又由于辞典的任务只限于解释词语,而不在于构建宏观语言学理论,因而我们又用“微观”一词对它加以限定。语言工作者在各种专著和论文中对语言的运动规律和某些语汇加以研究,做了许多有创造性的工作,为辞典编纂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和资料,但那代替不了辞典。只有辞典才能在归纳的基础上,总结人类研究语汇的成果,并通过辞典编纂者创造性的劳动,全面地推进这种研究;只有在辞典中,才可能实现词语研究在归纳基础上的全面性。

让我们换一种说法:任何一部语言研究专著,只要企图在归纳基础上实现对词语作相对全面的研究,它就必然具有辞典的性质。例如,对古籍中词语的注释是一种一般语言研究,但清代阮元将古代词语注疏集中,分领于字词之下,这就有了归纳的基础和全面的性质,按这种方法编出的《经籍纂诂》,也就具有了辞典的性质;朱起凤的《辞通》,将古汉语中词语通假使用的现象集中,是专著也是辞典;王力的《同源字典》是同源字研究专著,但由于具有建立在归纳基础之上的全面性,因而也具有辞典性质。是语言学专著和注释性专著,却显示了无可辩驳的辞典性质。此外,还可以举出《尔雅》、《方言》、《释名》、《字诂》、《词诠》,直到《现代汉语八百词》等许多。这无数例证的存在,证实了以下的概括可以成立:辞典是以归纳为基本方法,对词语作全面研究的著作。

需要略作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微观”,是就其研究重点在于组成语言的最小单位即词语而言的,并不是说不要宏观理论指导;这里所说的“全面”,指的只是某种类型或层面的词语范围内的相对全面,是指研究者主观意图中所力求达到的全面。

三

如果以上看法限于语文辞典,也许不会引起异议。对于专科(百科)辞典,上述定义也适用吗?回答是肯定的。

一些研究者反对将专科辞典划属研究语言的著作,他们的主要而且关键的论点,就是认为专科辞典所释对象与语文辞典不同。如前所引,他们认为专科辞典“不是释词,而是释事物、释概念、下科学定义,介绍有关知识”。这个观点似是而非。首先,专科辞典的诠释对象决不可能是物本身,而只可能是代表这些物的一个个词目。这些词目指向物,按照索绪尔的观点,可以是该物的“能指”(signifiant),而概念则是该物的“所指”(signifié)。词目、概念与物之间这种“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证明了这些词目的本质仍是一般语言学意义上的词。

词目作为词的性质与表达概念的性质其实是并不矛盾的。词是概念的语言表现形式,而概念是词的思想内核。专科辞典的释文注释词目,至少是既释概念又释词,因为词目首先是语言学意义的词,其次才是概念。

四

为什么只是对于专科辞典,一些学者才会产生其词目不是词语而是概念的误解,对语文辞典却少有误解呢?

我们知道,词并不是对等地、一对一地表达概念。“行、走”,“喊、叫”,“哭、泣”,凡近义词都是用不同的词表达同一个概念;“人流”既指熙熙攘攘走动的人群,又是“人工流产”的简称,则是同一

个词可分指不同概念的例子。在语词即日常生活词汇里,这种现象太普遍,不容许人们产生它们是概念而不是词的混淆。语文辞典中大量存在的同义异名现象和多义词也不容许人们产生这类疑惑。

但在专科辞典中情况就不同了。由于专科范围限制,词汇一下子简单化了。首先是异名减少,一个词表达一个概念的情况多起来。其次是义项减少,例如,“心”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四个义项,而在一部《医学辞典》中,就只剩下“心脏”一个义项,“思想,思维,感情”、“中心”、“二十八宿之一”等义项当然不收。“金”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七个义项,在《化学辞典》中当然就只剩下符号Au所代表的那一种金属了。由于排除了不属于本学科范围的义项,结果使得辞典的词目、语言学意义的词、逻辑学意义的概念之间的关系,成为近于1:1:1的关系。这便使人易产生词目就是概念的错误印象,以为专科辞典所注释的已是概念而不是词了。这当然不对。专科辞典的词目仍然还是词语,专科辞典所注释的仍然首先是词,而不能越过词这一层直接面对概念。

五

专科辞典的词目,是专科名词和专业术语。这些词语与一般语词之间,存在一条单向可逾越的界限。

说这条界限是单向可逾越的,意思是专科辞典决不应该收入一般语词即生活词汇,而只应该严格按照专科范围收入专科词语和专科义项。对于专科辞典来说,这条界限应该是不可逾越的。反之,一般语文辞典则可以而且应该收入一些专科词语。对于语文辞典来说,收录专科词语这条界限又是可以逾越的。

语文辞典是否收入某个专科词,只应遵循一条标准:该词是否已稳定地进入了大众的日常生活。

某个专科词是否进入日常生活,是与该词所指向的物进入生活的程度或科学成果的出现及其普及程度紧密相联系的。“疫苗”、“原子”、“频道”、“芯片”、“光纤”、“波段”等等,都曾经是地道的专科词语,而现在都已作为一般日常词语被语文辞典收入,就是因为它们所指向的物都已稳步进入到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之中。

专科名词和专业术语与一般语词之间这种单向可逾越的界限,是由专科词语逐步向一般词语演变的单向运动规律所决定的。专科词语必将随着科技发展不断增多,而作为日常一般词语的一个重要源泉,又必将随科技进步及其成果的普及,不断进入到一般语文辞典中来。

六

用专科辞典是“下科学定义”这一点来证明专科辞典与语文辞典的本质不同,是不值得辩驳的,因为“定义释义法”是现代辞典所共同采用的释义法,这已是通识了。问题在于目前学界还存在一些由语文辞典或专科辞典的不同特点而引起的模糊认识。有些语文辞典工作者提出“语文辞典中专科词语的语文化”命题,将语文辞典所收专科词语视为需要同化的异己;而有些专科(百科)辞典工作者也与之呼应,提出“语文词典对专科词语的解释,在内容和文字表达方法两个方面都应与专科词典有所不同”^⑤,并从释文的内容、表达的方法两个方面说明专科辞典应具有科学性,而语文辞典则应具有通俗性。

这命题其实又是错误的。因为科学性是对辞典释文的共同要

求,而尽可能通俗亦是共同要求。专科辞典由于读者对象一般预计是专家,故可以多用些术语、图表和数据,通俗的标准是要让专家能读懂;而语文辞典预计是给更多不是专家的读者使用,所以只能少用一些术语等,通俗的标准自然也不一样。科学性要求是共同的,通俗性要求则来自不同读者对象的要求,而不来自辞典性质的区别。一部给少年儿童使用的专科辞典也要有相当程度的通俗性,这可证明本文的观点不误。

七

既然专科辞典与语文辞典一样,也是微观研究语言的著作,它当然就不能“不受语言学的制约”,也不能“不需要语言学的指导”。相反,与语文辞典一样,专科辞典的编纂,也必须有意识地用语言学理论指导。

第一,专科辞典收词,必须遵循前面所述单向不可逾越的原则,只严格收入专科词。有学者以为,既然语文辞典应收入一些专科词语,那么专科辞典也应该收入一些语文词。^⑥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专科词语逐步向一般词语演变的单向运动规律,辞典不应违反。

第二,专科辞典立目,首先必须遵循语言规律以判定价值。语言学中词汇使用频率的标准,在语文辞典中是最重要的立目参考指标,在专科辞典中同样也应是最重要的立目参考指标。其次,对词目的界定也必须遵循语言规律,消灭目前许多专科辞典中存在的以临时搭配立目等非规范现象。

第三,专科辞典释义,也应该在语言学理论指导下深入研究,得出理性认识,从而打破目前专科辞典以定义方式为唯一释义方

式的既有模式,针对不同层面的读者,大胆采用诸如描写式等释义方式。释文行文,则应严格按照准确、简明等语言学要求。

第四,义项分立问题。由于认识模糊,一些专科辞典不注重义项划分,许多当分立的义项往往作释文层次处理。其实专科辞典中的义项分立,对于辞典使用者理解词义很有帮助。有些辞典已尝试着做了。例如“散声”一词,在中国音乐中有两个含义,既指七弦琴空弦音,又指有声无词的曲调,《中国音乐词典》就分设了两个义项;逻辑学中“推断”一词,既指推理所得的结论,又指假言判断的后件,《逻辑学辞典》分设两个义项,就比只设两个释文层次要清楚鲜明。这种划分,也应以语言学理论作为指导。

总之,由于辞典学并未脱离语言学而独立,因而辞典工作者应该自觉运用语言学知识指导辞典编纂实践。

附 注

①② 《辞书研究》1990年第4期第15页。

③ 《辞书研究》1990年第6期第4页。

④ 《辞书研究》1990年第6期第11页。

⑤ 《辞书论集》第86—88页,知识出版社,1987年。

⑥ 见王知伊《专科词典中的语文词目》,《辞书研究》1985年第2期。

试谈辞书出版工作的特殊环节

程 荣

辞书是供人们查检、为人们释疑解惑的工具书。提高辞书出版质量,对提高全民素质具有重要意义。作为出版者,如果把出版辞书与出版一般图书相等同,不了解辞书出版的特点,就可能忽略某些特殊环节,而影响辞书出版质量。笔者认为,在辞书出版工作中,主要有以下几个特殊环节不应忽视。

一、编辑的提早介入

一般来说,稿源有主动组稿和自然来稿两种情况,从质量上考虑,出版社大多倾向于前者,对于辞书稿件更是如此。辞书不同于一般图书,其编纂特点的复杂性决定了出版社的编辑需要提早介入,在作者编前及编写中早期做一些必要的摸底工作。

1. 开编前察看编写方案的拟定情况

任何一部成功辞书的背后都必然有一套详细周全的编写方案。例如,我国第一部现代汉语字典是1953年出版的《新华字典》(魏建功先生主编)。据金克木先生回忆,这部字典的编写计划于1948年秋冬之际开始酝酿,1949年北京解放后,经过集体讨论,由魏先生亲自执笔写定,1950年开始按照这个编写计划付诸实施;我国第一部以记录普通话词汇为主的《现代汉语词典》于1956年

开始制定规划、体例,当年在《中国语文》连载了《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上)(中)(下),词典开编前已拟有3万多字的编写细则,并在1958年《中国语文》9月号公开发表了《现代汉语词典凡例和样稿》,广泛征求群众意见;语文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是一部严格按照我国建国以来各项语文规范标准编写的字典,开编前曾多次讨论编写方案,反复修订编写条例;《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大型重要辞书对编写方案也十分重视,均在编前拟定了极为详细的编写条例。

编写方案或编写计划,是辞书的总体设计,其编写的方方面面都应筹划其中,大致包括:编写宗旨和目的、编写特点和读者对象、收条范围、编写体例、编排和检索系统、插图和附录、资料工作等涉及辞书内容本身的诸多细节;还可包括组织领导和人员分工、编写程序和操作规程、时间安排和工作进度等组织实施计划。对于只涉及辞书内容本身的编写方案,也可称之为编写条例。辞书是由众多的条目构成,每个条目自成一体,又相互联系,从形式到内容都需要保持有机的统一,达到步调一致。因此,辞书编写条例与普通图书的编写提纲相比,对全书的成功与否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出版社的辞书编辑,对任何辞书稿件均应仔细审查其编写条例,对自组稿则需在编前较早进行。编前察看编写条例或编写方案,能从中了解书稿的具体操作情况,以此要求和督促作者。编辑通过察看编写条例,能够对书稿的基本情况有所掌握,事先提出有关意见,避免完稿后提出修改,牵一发而动全局,徒增工作量。

实践证明,编前没有编写方案的辞书不可能有质量保证。这是因为无论是大中型辞书,还是小型辞书,都会有交叉、互见等相关条目需要彼此的协调统一、相互照应。即使是一个人撰写,也无法一气呵成,同样必须有一个能够自始至终遵从的编写方案。因